

诗意的坚守与自由的追求

——格非《春尽江南》的知识分子形象及其意义

○ 李萃茂, 曾 熙

(赣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在新时期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的小说中,知识分子失去了坚守信念与理想、对人性之恶与时代之弊进行批判、对诗意人生与自由生命进行礼赞的启蒙者的光辉形象,呈现出来的是在无边欲望世界中的迷失与堕落,在功利与浮躁的世界中失去了坚守诗意与追寻自由的能力,他们在整体上成为外在世界的俘虏与囚徒。格非则在《春尽江南》中塑造了一种抗拒外在世界的欲望与堕落,从内在心灵世界寻找力量,在琐碎日常生活中追寻人生的诗意与生命的自由,虽身处边缘却对现实社会坚持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当代文学史中,这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关键词]知识分子形象;诗意;自由;《春尽江南》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作为具有独立人格、批判精神与人文关怀的知识阶层,本应成为社会良知与理性的代名词,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却呈现出异常复杂的一面,这种复杂性在现代文学中得到了充分表现。鲁迅笔下的“狂人”、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丁玲笔下的陆萍、钱钟书笔下的方鸿渐,等等,他们表现出不同的精神气质。而在当代文学中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知识分子形象是缺席的,或者说都是以反面人物形象出现在各种文学文本中。新时期以来,出现了一些知识分子形象,比如王蒙笔下的钟亦诚、丛维熙笔下的范汉儒、谌容笔下的陆文婷,等等,他们表现出相同的精神气质,从他们身上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他们以“高大”的形象站立在读者面前,给读者以心灵的感动和震撼。但这种“高大”很快便消失,他们逐渐消隐在琐碎的

日常生活之中,变得卑微平庸。知识分子的这种形象开始出现于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中,而在兴起于1980年代后期的“新写实小说”中则得以集中表现,比如刘震云笔下的小林、池莉笔下的庄建非,等等。而在王朔笔下,知识分子则成为被嘲笑挖苦的对象,揭示他们的清高、虚伪、自我膨胀等缺点。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行,以贾平凹的《废都》为标志,知识分子形象基本上被“欲望的旗帜”所裹挟,而他们的结局则或背叛、或出走、或死亡。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形象谱系中,格非的《春尽江南》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有着怎样的新特征?本文将把它放在新时期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背景中下进行考察,并分析其意义。

—

如果说1980年代前期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知识分子依然秉承着启蒙立场,坚守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承担着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的重任,扮演着精英的角色,比如《布礼》中的钟亦诚、《灵与肉》中的章永璘、《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天云山传奇》中的罗群、《雪落黄河静无声》中的范汉儒等,他们虽然在生活中历经磨难,但磨难只是他们自我完成的背景,他们都是以一种光辉的形象出现在作品中。但随后不久发表的《你别无选择》《无主题变奏》则意味着知识分子的精英形象受到极大的挑战。这是知识分子的时代镜像,因为精神乌托邦的瓦解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生命个体在这个变动时代的生存境况势必在小说中得到反映。1990年代尽管也有秉承理想主义的写作者,对精神堕落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这些知识分子形象主要表现在张承志与张炜的作品中,比如张承志《心灵史》作为一个知识群体的七个教主,那种强烈的“为人民”的忧患意识在他们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张炜《家族》中的宁珂为了理想,历经艰难困苦,付出巨大牺牲,表现出一种自我牺牲精神与英雄主义气概,其姊妹篇《柏慧》中的叙述人也是为了心中的理想而执着寻找。但这类知识分子形象寥落星辰,随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这类知识分子形象几乎没有,也许在一个物质的时代,他们必定是孤独寂寞的。

他们不仅是孤独的,而且还受到质疑和嘲弄,前者可以在刘心武的《风过耳》中看到痕迹,曾经以《班主任》闻名于世的刘心武在《风过耳》中描绘了一幅知识分子道德与人格整体滑坡的图画,比如作为文化部副局长的宫自悦纯粹是个“高级混混”。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也体现了这一点,父亲无法在祖父留下的士人气质及刚强人格中挽救生活的危机。后者则集中体现在王朔的小说中,《顽主》中的作家宝康,《一点正经也没有》中的方言,《你不是一个俗人》中的关汉雄老师,崇高、庄严、价值等精英知识分子的形象被彻底消解,他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虚伪、油滑、低俗的卑微形象,并受到作者无情的嘲弄与挖苦。而他们的精英形象被消解后的苦闷、无奈及在庸常中沉沦的形象则在同一时期的“新写实”小说中得到更集中的体现。池莉《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的四企

图唤起猫子等普通市民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但周围人对其嗤之以鼻。方方《风景》中杨朗的母亲(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她对二哥的启蒙遭到自己丈夫的嘲笑。而在刘震云《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池莉《不谈爱情》中的庄建非,方方《行云流水》中的高人云,《无处逃遁》中的严航等,在他们身上,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价值理念向世俗物欲屈服,内在精神追求已变得无足轻重,在生活中处于疲惫困顿、失意受挫的状态之中。而在苏童两篇主人公都叫杨泊的小说《离婚指南》《已婚男人杨泊》中,作为知识分子的主人公不愿同流合污,坚持自己的理想与原则,但他们却一个成了别人眼中的疯子,一个跳楼自杀。在一个物质利益高于一切的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对人文理想的坚守是何其艰难。这些不多的坚守者也大多处于社会的边缘,王心丽《凯斯酒吧》中的丁建中,在不断的人生变化中从没有停止对人生意义的追问,虽然几经周折后他赚了钱,开了酒吧,物质上很富有,但因为他的追问而放弃当今主流社会的游戏规则进行自我放逐,以一种抵抗的姿态拒绝任何社会意识形态,做一个城市边缘的游离者。与之类似的还有张炜《外省书》中的史珂。而在朱文《水土不服》中的青年诗人康生,《小羊皮纽扣》《五毛钱的旅行》《去赵国的邯郸》中的小丁,他们古典的价值观无法面对这个世界,却又找不到新的价值观,想要追求却不知如何追求,不知何去何从,在城市的边缘漂泊,类似于波德莱尔笔下的“游荡者”,成为新时代的“零余者”。

但更多的知识分子形象不是“零余者”,或者说不甘心做“零余者”,他们成为了物质时代的宠儿,在“欲望的旗帜”的裹挟下,在自我的放逐中沉沦,在欲望的迷宫中狂欢。贾平凹《废都》中以庄之蝶为首的西京四大文化名人,沉溺于金钱肉欲,丧失文化操守,在灵肉煎熬中走向毁灭。格非《欲望的旗帜》中的宋子矜、贾兰坡、老秦等教授们,借学术的幌子上演各色欲望的丑剧,知识分子的形而上世界坠入世俗欲望的深渊之中。阎真《沧浪之水》中的研究生池大为,由理想主义的坚持者变为现实主义的同流合污者,从权力的鄙弃者变为权力的依附者。张者《桃李》中以博导邵景文为代表的大小知识分子,为了金钱和美色使出浑身解数,他们彻底被欲望和金钱赶向消费市场。陈应松《魂不守舍》中的文学硕士、著名记者王开成名之后,沉醉于在几个女人之间周旋,昔日崇高的精神追求在金钱与肉欲面前彻底崩溃。何顿《生活无罪》中的教师何夫,见了一次发财的同学后便放弃自己的艺术理想而追随他,在金钱中沉沦。还有朱文《弟弟你好》《我爱美元》中的“弟弟”,莫怀戚《经典关系》中的东方云海,张抗抗《作女》中的卓尔,阎连科《风雅颂》中的李广智、赵茹萍,王家达《所谓作家》中的胡然,董立勃《米香》中的许明,邱华栋《教授》中的赵亮,汤吉夫《大学纪事》中的何季洲,史生荣《所谓教授》中的白明华,朱晓琳《大学之林》中的俞道丕,张炜《能不忆葵蜀》中的淳于,倪学礼《站在河对岸的教授们》中的金河、李冰河等教授,南翔《硕士点》《博士点》中的校长、教授们等等。在这些以高校知识分子题材为主的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备受世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教授已经彻底堕落,为了权力、金钱和美色而不惜一切手段,在各种欲望的迷宫中完全迷失自己,

不要说肩负知识分子的批判使命和人文关怀,就是连起码的道德和尊严也 already 丧失,而大学校园作为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宁静神圣的象牙塔也成为了追逐各种欲望的喧嚣的名利场。

上述简单的梳理虽可能有遗漏,但在整体上可以看出新时期以来知识分子形象的面貌。从上文能够发现自 1990 年代后期开始,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虽表现出各自的特点,但在整体形象上则呈现出一种共同的精神状态,那就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失去了坚守信念与理想、对人性之恶与时代之弊进行批判、对诗意人生与自由生命进行礼赞的启蒙者的光辉形象,呈现出来的是在无边欲望世界中的迷失与堕落,在功利与浮躁的世界中失去了坚守诗意与追寻自由的能力,他们在整体上成为外在世界的俘虏与囚徒。而他们在作品中的结局无一例外都如有的研究者所说的那样——或背叛或出走或死亡。^[1]在这个多元的时代中,知识分子形象却表现出单一的一面,这是为什么?知识分子形象有没有新的可能?格非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提供了这种可能。

二

《春尽江南》是格非“乌托邦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其他两部为《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从 2004 年的《人面桃花》到 2011 年的《春尽江南》,格非以近十年的时间建构了他关于中国社会、历史、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想象与思考。对知识分子精神心理的关注是格非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与理想追求也是“乌托邦三部曲”最核心的内容。《人面桃花》讲述了民国初年的知识分子对理想社会的不息追寻。小说为我们设置了一个“花家舍”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居住在里面的陆侃、王观澄、张季元等实际上是集传统士大夫理想、革命者和绿林匪盗于一身的人物。陆秀米后来闯荡东洋,学习了近代社会知识与革命理念,试图全面解决教育、医疗、法律、道德、民生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但最后只能在“不能承受之重”中走向解体与失败,陆秀米也死于无援的孤寂之中。《山河入梦》写的是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梦想与实践,格非对历史作了某种象征性的展示,同时对“乌托邦”进行了深入探析。小说的男主角、陆秀米的儿子谭功达解放后成为梅城县长,兴建水库、安装电灯、推行合作社等政府行为被格非转换为谭功达超越现实个体,探寻生命意义的步骤,以达到其“诗意栖居”的乌托邦梦想的实现。然谭功达是个生活和官场的异类,不懂交际、不懂官场与政治,身上具有士大夫的影子,最后失去权力,成为一个多余人。女主人公姚佩佩身上有敞亮明净的生命形式与超越世俗的理想追求,她寄托着作家的乌托邦期望,然而她最后却是生死未卜。《春尽江南》通过书写诗人谭端午与律师庞家玉这对渐入中年的夫妻的人生际遇来深入思考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深刻透视生命个体尤其是知识分子在这个剧变时代的命运。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与前文所述的知识分子形象相比,呈现出了新的特点。

谭端午(谭功达的儿子)是位诗人,在 80 年代,“诗人”不仅仅是一种身份和

荣耀,它还可能换来许多现实的东西,比如性、金钱。谭端午就是如此,还是学生的李秀蓉也就是后来的庞家玉因为谭端午的诗名,前来拜访他并向他献身,而谭端午却在李秀蓉发着高烧昏迷不醒的情况下不辞而别,还拿走了她所有的钱。这种类似小偷的行为,因为是诗人所为却显出另一种色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别人的口袋里拿钱,不仅不是一种冒犯,相反是一种友谊和亲密的象征。”^[2]但这样的光辉很快便消失了:“可若若不知道的是,他为父亲感到骄傲的那些理由,在当今的社会中已经迅速地贬值。‘诗人’这个称号,已经变得多少有点让人难以启齿了。”^[3]格非把知识分子命运的变化放置于日常的生活际遇之中,让他们的人生选择在日常中呈现。谭端午硕士毕业后因与导师决裂而几经周折到鹤浦地方志办公室上班,从此自我放逐,生活于社会的边缘,在一个恶性竞争的年代他全然置身事外。他的生活内容就是写诗(尽管羞于拿出去发表),读《新五代史》,听古典音乐,与有限的几位朋友交往,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他对事业与婚姻毫无激情。他的妻子庞家玉说他“正在这所小楼中一点一点地烂掉”,“全部的努力是成为一个无用的人”,^[4]但他对妻子则以爱和温情来回报,哪怕她曾经背叛自己。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很差,连网球与薯片都混淆,去出租房子却把房产证落在中介处,从而导致自家房子被占,而面对房子被占的事实则毫无办法。尽管在生活中谭端午是个“无用”的人,但他远离世俗欲望的侵扰,守护着自己的精神世界,坚持“无用之为大用”的人生哲学,不被琐碎平庸的生活消磨掉内在的光芒。他对飞速发展的社会充满悲观与批判,比如对“牺牲”的阐述。他认为“牺牲”在现实环境中逐渐隐没,少有的牺牲者也得不到纪念、追悼、缅怀。甚至牺牲本身的意义和目的也承受着被时代消解的命运,在他看来,正因为今天的牺牲者没有任何价值,所以他们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牺牲者,牺牲于无意义。对充满着梦幻色彩的“乌托邦”他毫不关心乃至冷漠面对,在他心中,祖辈与父辈那种创造“大同世界”的伟大抱负已经烟消云散,甚至他对“乌托邦”这个词也异常反感。当他哥哥王元庆期待通过自己的力量来“大庇天下寒士”而投资建设“花家舍公社”,邀请谭端午加入他的队伍时,谭端午拒绝了。当绿珠希望在云南建造一座“香格里拉”而询问谭端午的意见,他则用福楼拜小说《布法与白居榭》来告诫她要乌托邦思想保持警惕。无疑,谭端午身上寄托着作家的某种期待。

作为诗人和人文知识分子的谭端午没有按照读者的阅读期待尝试着重回社会中心,也没有在边缘的处境中自暴自弃而走向堕落,而是在边缘的世界里对急剧变幻的时代风云进行冷静观察,对消费时代的复杂人性进行深刻审视,坚守着自己的诗意生活,保持着心灵世界的最大自由。何为诗意?海德格尔认为诗意是作为人存在的内在的尺度,是一种把人从非人性的、隐蔽、异化的生存空间中超脱出来的,使人性得以健全发展的力量。^[5]谭端午执着地坚持着这种“作为人的内在尺度”,不为欲望的世界所俘虏,在理想世界与现实人生之间,他保持着内敛的怀疑精神与深刻的批判立场,在“边缘”的生活境地,以“自我疏离”的人

生姿态进行坚守与反抗,把自己从“非人性的、隐蔽、异化”的生存空间中超脱出来。这种“超脱”为他冷静地审视现实提供了一个相对清澈澄明的视域。小说有一个细节极具意味,那就是端午不断地阅读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在一个浮躁与欲望四处弥漫的时代,谭端午之所以钟情于这本“衰世之书”,并对书中那些身处乱世的普通大众生出无限同情,这是因为他看出我们所处时代因为“诗意”的缺乏而导致精神世界的荒芜。每个人不仅处在一定的时代大环境中,也处于各种人生困境之中,如何摆脱这种困境是每一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谭端午不断地阅读《新五代史》,既是他与时代对话的一种方式,也是他突破自我局限,走向“诗意地栖居”、追寻心灵自由的象征。小说里还有另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细节,那就是小说中的“睡莲”意象的使用,“睡莲”在小说中一共出现十四次,在这十四次中,七次描写招隐寺的睡莲,这七次中又有六次是刻画二十年前的,一次描写二十年后。其中,对二十年前招隐寺那个夜晚的不断书写与描绘,以及对当时的睡莲不厌其烦的描写,是小说里一个不可忽视的细节。小说还以诗歌《睡莲》结尾:“仿佛/这天地仍如史前一般清新/事物尚未命名,横暴尚未染指/化石般的寂静/开放在秘密的水塘/呼吸的重量/与这个世界相等,不多也不少”。^[6]这是作家的情感寄托与生活希冀,是一种对美好人性的追忆、对高洁品质的追求,也是对诗意人生的坚守。时代的浮杂和各种人生困境是外在的非人性的异化力量,它们会将人推向不可知的人生非正常化的生存深渊,前文所述的许多知识分子形象就是这样进入人生的深渊。小说中的“睡莲”,在谭端午看来具有了一种超越的力量,它能召唤正常人性的回归,能使欲望化的生命得以超越而实现“诗意地栖居”,从而使个体生命从外在的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心灵的敞开与自由。因此,“睡莲”在小说中也就具有了别样的意义。不管是《新五代史》还是“睡莲”,都是谭端午对当下知识分子人生困境的一种深入思考。在他看来,任何乌托邦理想在尘嚣甚上的功利主义时代都是空想,只能像肥皂泡一样破灭。正如王元庆的“花家舍”成了“销金窟”,绿珠的“香格里拉”成了一出闹剧。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在这浮躁、功利、欲望的社会语境中势必被消解,乌托邦理想无法在现实大地上生根、开花与结果,只能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情怀。如此,知识分子如何面对这样的时代环境与人生困境?或者说在一个极度丰富而又极度贫乏的年代“诗人何为”?诗人谭端午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就是在缺乏诗意、人性被异化的生存空间中坚守虽然边缘但却“诗意”的生活方式。在小说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生活方式是对“非诗意”现实的一种对抗,并且这种对抗背后蕴含着对美好人性归复的呼唤(阅读《新五代史》可作如是观),由此,使被异化的人性得以回归,从而实现“诗意地栖居”,抵达心灵自由的境地。因此,谭端午对诗意的坚守与对自由的追求,是一种选择与思考,也是一种批判与反抗,他为知识分子在一个“非诗”时代如何坚守“诗意”而实现生命自由,同时,通过对自我生命自由的实现来与“缺乏诗意”的时代进行对话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与谭端午不同的是,庞家玉是个世俗生活的强者,她对时代的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她拒绝谭端午给她在《鹤浦文艺》谋的差事,“她已经摸到了时代跳动隐秘的脉搏,认定和那些早已被宣布出局的酸腐文人搞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经过高人指点和刻苦自学,她如愿取得了律师执照,与人合伙,在大西路上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7]虽然她是因为诗嫁给谭端午,但变化的现实使她早把诗遗忘,因为喜欢诗的是李秀蓉:“‘秀蓉’所代表的那个时代,早已远去、湮灭。它已经变得像史前社会一样的古老,难以辨识。而‘庞家玉’的时代,则使时间的进程失去了应有的光辉,让生命变成了没有多大意义的煎熬。”^[8]这是谭端午的思考。而对庞家玉来说,她认识到了前者,但没有理解后者。她对谭端午的“不思进取”非常不满:“难道你就心甘情愿,这样一天天地烂掉?像老冯那样?”为家庭的富足、为事业的发展、为儿子的进取,她殚精竭力,是一个社会认同的成功人士。她曾经出轨,但很快便斩断婚外情的欲念,没有让其泛滥成灾。庞家玉不停地奔跑,希望达成心中的一切愿望。但她也有无能为力之时,当房子被占,因为占居者复杂的社会关系,身为有名律师的她最后还是需要借助黑社会的力量,这是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的无力与无奈。她最后身患绝症,悄然离家出走,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离开这个世界,带着对儿子、对谭端午的眷恋。这种“离开”同样也具有深长的意味,这是否可以看作是庞家玉对自己那种被欲望所囚禁的“非诗意”生活的一种反思?她的患病无疑是一种隐喻,格非通过这个人物的命运来暗示我们,知识分子要摆脱“绝症”一样的人生困境,寻找与坚守“诗意”的人性净土、理性地反思被“非诗意”世界所异化的生存空间、追求“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是获得“健康”生命与抵达自由境地的重要方式。此外,围绕谭端午与庞家玉身边的知识分子形象还有徐吉士、冯延鹤、绿珠等,他们虽然不是小说的主人公,但他们的形象也异常鲜明,尤其是衣食无忧、喜欢诗歌,却患有抑郁症的绿珠。他们或赶着时代的潮流,或被时代所遗忘,或被时代所挤压,但我们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前文所述的那种欲望的狂欢,他们只是在各自的日常生活中或追随现实或淡漠现实或远离现实,时代的潮流裹挟着他们,但他们身上没有呈现出堕落与疯狂。他们身上都不同程度地体现着格非对知识分子坚守诗意的生活方式、摆脱被异化与被囚禁的人生状态,从而抵达生命自由的期待。

《春尽江南》是一则时代寓言,这是格非对自己曾经精心建构的“乌托邦”的理解,我们从他的《人面桃花》与《山河入梦》中可以看出他对“乌托邦”的渴求,尽管也带着反思,但在《春尽江南》中,他已经对“乌托邦”彻底放弃。春天是江南最美的时节,失去春天的江南会是什么?当王元庆充满理想色彩的“花家舍公社”被张有德的“伊甸园”(合法而隐蔽的销金窟)所取代,而王元庆也住进了自己修建的精神病院,这意味着理想“乌托邦”的彻底终结,这是作家对当下社会深入洞察后的选择,也是作家对知识分子在欲望化时代保持正常的人性、寻找“诗意栖居”的生存空间与生活方式,从而保持自由的灵魂,与时代展开对话的希冀。

三、结 语

不可否认,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文化的转型,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启蒙形象已逐渐隐退,他们从社会中心走向时代边缘,在角色扮演与价值定位上陷入一种迷茫、焦虑、困惑的状态。他们失去了真实的自我,只是以表演的姿态面对世界。这是知识分子的悲剧。也许,在当下,以一种空疏抽象的精神姿态追求一种农业文明时代的“乌托邦”已经显得可疑,正如有的论者在对张炜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评价时所说:“张炜笔下的知识分子流于虚假,他试图以自己构筑的农业理想来对抗现代文明的扩张,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一个虚假的精神姿态而已(估计连张炜自己也很难相信它在现实社会中会是有效的)。”^[9]但一位清醒的知识分子则能够在边缘化地位中找到重塑自我形象的契机,因为身处边缘反而能给知识分子带来相对自由广阔的精神空间,能使他们冷静地观察这个时代的生与死。而“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必须随时保持一种‘自救’意识,永远与现存的社会保持一段距离,保持一种自我生成的批判向度,这恐怕正是知识分子存在的全部价值和意义所在。”^[10]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大部分小说没有把清醒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出来,塑造的只是一些“迷失”与“堕落”的“知识者”形象,尽管他们也是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但绝不应该是全部。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更需要塑造出“清醒的知识分子形象”,因为他们是使这个疯狂的年代保持清醒和理性的重要力量。他们在这个“非诗意”的世界中、在这个被欲望所囚禁的被异化的生活里,冷静地进行反思、批判与坚守、找寻,反思、批判“非诗意”的生存空间,坚守“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找寻没有被异化的、正常健康的人性,从而实现个体生命的自由。这需要我们的作家与时代保持一定的距离,少些“潮流性”,多些“超越性”,深入理解知识分子与现实的关系,仔细探讨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同时,拥有清醒的价值立场和审美判断。就这一点来说,格非在《春尽江南》中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尤其是诗人谭端午的形象,那种身处边缘而秉承诗意坚守与自由追求的姿态、反抗被异化的“非诗意”的生活方式,对现实社会坚持批判立场的形象,在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形象处于“迷失”或“堕落”之时,有其不可忽视的文学史意义。

注释:

- [1] 孟繁华:《21世纪初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文艺研究》2005年第2期。
 [2][3][4][6][7][8] 格非:《春尽江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4、61、44、374、6、28页。
 [5]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87页。
 [9] 谢有顺:《文学的路标》,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页。
 [10] 丁帆:《知识分子的价值定位》,《文艺争鸣》1995年第5期。

[责任编辑:书 缘]